

中德日常叙事比较研究

语篇结构的文化性
Kulturspezifik der Textstruktur

刘齐生 著

语篇结构的文化性

Kulturspezifität der Textstruktur

刘齐生 著

明德创意出版社

责任编辑 明德创意出版社

封面设计 林梓权

语篇结构的文化性

Kulturspezifiek der Textstruktur

明德创意出版社发行

E-mail: publishing@ffmm.com

32 开 2004 年 6 月第一版 2004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88-97675-1-1

Inhaltsverzeichnis 目录

I. Chinesische Einleitung	1
中文导读	
II. Textteil	9
主要部分	
0 · Einleitung	9
引言	
1 · Kontrastive Narrativik: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Forschung und die zentralen Fragestellungen	11
比较叙事学：研究概览和核心问题	
2 · Erzähltextmodelle: 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methodischen Ansätze	18
叙事语篇模式：研究方法概览	
3 · Zur Anlage der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	23
与调查材料相关的问题	
3.1 Vorüberlegungen	23
初步设想	
3.2 Untersuchungsgrundlage	24
研究基础	
3.3 Aufarbeitung des Datenmaterials	25
数据整理	
3.4 Zur Wahl der Untersuchungsaspekte	26
研究视角	
4 · Grundform und makrosemantische Elemente	27
宏观语义要素的基本形式	
4.1 Theoretischer Rahmen	27
理论框架	
4.2 Analyseverfahren	30
研究方法	
4.3 Untersuchungsergebnis	31
研究结果	
4.3.1 Die narrative Superstruktur	31
叙事的超语篇结构	

4.3.2 Makrosemantische Elemente	36
宏观语义要素	
4.3.2.1 Dargestellte Streitfolgen i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Alltagserzählungen	37
德汉日常叙事中对吵架结果的叙述	
4.3.2.2 Zur Bedeutung stagnativer Elemente in chinesischen Streiterzählungen	38
僵局在汉语吵架叙事里的含义	
4.3.2.3 Exkurs: Das Gesichtskonzept als Hintergrund chinesischer Erzählstrategie	41
附加说明: 汉语叙事策略中的面子	
4.3.2.4 Der „Kompromiß“ als Leitmotiv deutscher Streiterzählungen	43
德语吵架叙事中“和解”作为基本的叙述动机	
4.3.2.5 Das Rache-Motiv als mögliche Auflösung chinesischer Streiterzählungen	45
汉语吵架叙事中“报复”动机作为可能的叙述末尾	
4.3.2.6 Zur Darstellung der Streit-Ursachen innerhalb der untersuchten Erzählungen	46
叙事中对吵架原因的叙述	
4.3.2.7 Personenbeschreibungen: Mehr oder weniger detailliert	46
对人的描述: 着墨的差异	
4.3.2.8 Zeit- und Ortsangaben	48
对时间和地点的叙述	
4.3.2.9 Zur unterschiedlichen Darstellung der Handlungsphase i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Streiterzählungen	50
德汉吵架叙事中对冲突阶段的叙述	
4.3.3 Zusammenfassung	54
总结	
5 · Zeit-Aspekte	57
时间	
5.1 Zur Einführung in das Problem	57
问题的引入	
5.2 Analyseverfahren	62
研究方法	
5.3 Untersuchungsergebnis	64
研究结果	

5.3.1 Datierungen	64
对日期的标注	
5.3.2 Zeitraffung in ihren unterschiedlichen Ausprägungen	64
叙事中时间的不同表现方式	
5.3.3 Zum Problem der Zeitdeckung	66
时间一致性的问题	
5.3.4 Die Zeithinzufügung	66
时间嵌入	
5.3.5 Zeitstufen	68
时间梯阶	
5.3.5.1 Vorausdeutungen	68
前指	
5.3.5.2 Rückwendungen	69
后指	
5.3.6 Zusammenfassung	70
总结	
6 · Kausalität	72
因果关系	
6.1 Theoretische Grundlage	72
理论基础	
6.2 Analyseverfahren	75
研究方法	
6.3 Untersuchungsergebnis	77
研究结果	
6.3.1 Zusammenfassung	83
总结	
7 · Spannung	84
紧张	
7.1 Einleitung: Zur besonderen Bedeutung von „Spannung“ in Alltagserzählungen	84
引言: “紧张”在日常叙事中的特别含义	
7.1.2 „Spannung“ im historischen Überblick	84
对于“紧张”的研究	
7.1.3 Der Begriff der Spannung	85
“紧张”的概念	
7.1.4 Die temporale und räumliche Dimension von „Spannung“	87
“紧张”的时间和空间维度	

7.1.5 Analyseproblem	89
研究的问题	
7.2 Analyseverfahren	90
研究方法	
7.3 Untersuchungsergebnis	92
研究结果	
7.3.1 Zusammenfassung	101
总结	
8 · Abschließende Diskussion	103
讨论	
Literaturverzeichnis	106
参考文献	
III. Anhang: Korpus	112
附录: 研究的原始材料	

1. 导读

一. 问题

生活中人人都有叙述 (erzählen¹) 的欲望, 人们通过叙述传递信息、表达他们的情感和思想。自古以来从叙事(Erzählung)里产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我们正是通过这些故事了解古人和其它的民族。人离不开叙述, 人与人的联系和了解不都在这叙述之间么? 叙事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人们叙述的内容往往与他们的经历密切相关, 人们叙述的往往是他们经历中最精彩的一段。

关注叙述, 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叙述一直是人文科学研究的内容。本书也谈论叙述, 并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叙述作为研究素材, 但本书并不是一本关于普通人生活的书。本书关注的是: 一个普通人在组织叙述时是否会受到他的文化背景的影响? 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两个研究方面, 一是语篇的结构, 它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语言学关心的是语篇的形式, 以及意义是如何通过这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但是语篇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任何一个语篇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而生造出来。因此以上问题涉及到的第二个研究方面就是文化背景, 它属于人类文化学探讨的内容。

二. 研究背景

研究叙述问题的著作不少, 叙述语篇的结构在各种教科书里也已经固化为一成不变的模式, 形成了所谓普遍性原则。特别是叙事理论, 其发展与普遍性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仅就西方叙事理论而言, 其发展从古到今都有着一脉相成的特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见伍蠡甫 1979: 76) 里论述道: “史诗的情节也应象悲剧的情节那样, 按照戏剧的原则安排, 环绕着一个统一的行动, 有头, 有身, 有尾, 这样它才能象一个完整的活东西, 给我们一种它特别能给的快感。”法国结构主义者继承了这样的观点 (Todorov 1968)。而 Propp(1928)

¹ 德语动词 *erzählen* 和名词 *Erzählung* 都表示叙述, 而在中文里则有“叙述”和“叙事”之分。作者认为表示言语过程, 而表示通过言语完成的语篇。因此在本文里出现了两个概念, 但它们在意义上没有区别。

对俄国童话的研究使叙述理论的普遍性概念进一步得到公认。此后在生成转换语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事语法 (van Dijk 1972, Petöfi 1972, Rumelhart 1975) 以及叙事学 (Prince 1973, 1982), 同样试图建立一种普遍性分析模式。近来流行的认知理论 (van Dijk 1980, de Beaugrande & Colby 1979, Quasthoff 1980), 其主要研究一般人类获取、储存和输出知识的行为过程, 也将语篇结构的普遍性原则运用到认知叙述研究之中。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 当人们对西方文化圈以外的材料进行分析时, 才开始质疑语篇结构的普遍性原则。如 Kintsch & Green (1978) 在研究印第安人的故事时发现, 故事里的主角经常会变化, 故事情节并不一定存在因果和时间关联。因此, 他们认为故事语法的结构模式不一定适于非欧语圈的叙事传统。Polanyi (1979) 也反对将西方的叙事原则普遍化。他在对新丰亚那上著人的叙述进行研究后指出: 其语篇不是建立在事件的时间先后基础之上的, 而是依照事件发生的地点转换构造叙述。他进一步指出, 叙事结构研究必须充分考虑文化特性, 文化往往决定在一个社会中什么值得叙述和可以进行叙述。

Tannen (1980) 等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 不同语言的语篇具有某些不同的特点。这些研究以一部无对话与旁白的电影 (“梨的故事”) 为基础。Tannen 让一组说英语和说希腊语的学生看完电影后, 把故事复述下来。通过对这些语篇进行分析, 她得出结论, 希腊语语篇倾向于对影片中发生的事加以解释而不是报道, 而英语语篇则倾向于对影片中发生的事加以报道而不是解释。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绝大多数英语语篇在提到摘梨的人的时候, 只是简单地称他为 “人”; 而许多希腊语语篇却加进了主观猜测, 采用解释性的称呼, 称他为 “农夫” 或 “农业工人”。2. 大多数英语语篇只是简单如实地描述人物的行为; 而有相当一部分希腊语语篇加进了主观评论, 采用解释性的描述。3. 即使一些英语语篇中也夹有一些评论, 但这些评论大多是对电影本身所作的评论; 而希腊语语篇中的评论大多是对人的行为的评论。四, 在细节的描写方面, 说英语的学生倾向于尽可能将他们所记得的细节全部写进篇章; 而说希腊语的学生则倾向于将他们认为与故事主题有关的细节写进篇章。

Mihm (1990, 1992) 在比较了德国和日本两国学生以及孩童的口头叙述后指出, 用西方业已形成的叙述结构套日本人的叙述语篇往往会出现抵触, 会对日本语篇产生理解偏差。他认为, 两国语篇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其叙述重点不同, 德国人将叙述视点放在事件的冲突上, 而日本人的叙述视点在事件之外。他并且进一步认为, 造成这种差异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1) 语言风格与习语、比喻、指代结构有关; 2) 语篇结构以及表达方式与文化传统有关; 3) 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 人们大脑中已形成了特有的叙述模式。

Coe & 胡曙中 (1989) 通过对中英报刊杂志上的语篇对比, 证明线型和螺旋型结构分别是英文和中文的典型修辞模式。据此他们认为 Kaplan (1966) 的假设是成立的。持相同看法的还有王墨希 & 李津 (1993) 以及马秉义 (1996) 等。

Günthner (1993) 首次将中国人的对话和口头叙事与德国人的叙事进行了比较。她认为, 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和修辞传统, 如而子问题及起、承、转、合的写作要求, 对中国人的叙事仍有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人说话和叙述都比较含蓄, 叙述时往往不直接切入主题。她认为必须从东方人强调形与神、阴与阳这样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人的叙事。

在中国, 近来也有不少学者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西方叙事原则的普遍性概念提出了批评。其代表人物申小龙 (1990) 认为, 西方民族习惯于焦点透视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人则更多采用散点透视的方法。如同绘画, 西方油画中心明确, 景物层次分明。中国画则从整体上把握平远、深远与高远, 以景外鸟瞰和景内走动的思路使千里之景收于一幅, 纷繁的人物情节于一个画面。当然申的观点受到了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 汉语语篇所反映出来的形态只是语言本身造成的, 而并非中国人的认知和思维与西方不同 (孔宪中 1990)。比较具代表性的批评还有刘绍龙 (1995), 他认为, 人类思维的共性决定了人类语言的共性。因此比较东西方语言的特点时, 不可为了突出个性, 把本来没有那么复杂的东西说的玄乎其玄, 从而否定人类思维的普遍特征。

从叙事理论的发展角度来看, 叙事模式的建立经历了结构主义、生成转换语法和认知理论等三个主要阶段。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普

遍适用的叙述规则。因此，它们在对叙事进行分析时基本上将文化特性排除在外。由于它们的理论基础主要建立在欧美叙事传统之上，因此运用这一理论对其它文化圈的素材进行分析时，往往会产生片面的看法。最为典型的的就是 Kaplan(1966)。虽然他发现了文化对语篇结构的影响，但由于是从欧美修辞传统看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眼里非欧美学生作文中的陈述在绕圈子，对事物的描写不直接，作文中的观点不连贯等。有趣的是，他在后来的研究中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他(1987: 10)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认为自己的结构是直线形的，而把其它文化中的语篇看作是陌生的和有所偏差。虽然这个论点修正了他以前基于印象产生的结果，但这亦仅仅是变换了陈述的方式，并未能进一步指出不同文化的语篇结构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差异。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的研究逐渐将文化影响作为分析语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们尚未能触及叙事理论的基础。语篇的根本问题，如文化对宏观结构、联结手段等的影响尚乏人涉及。就有关中文叙事的研究而言，许多学者，如前文提到的 Coe&胡曙中(1989), Günthner(1993)等人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语篇基本结构的比较上面，而且看问题有先入为主之嫌，例如将中国古时的修辞传统(如八股文)看作是延续至今的写作习惯。这样的分析脱离了语篇的语义层面，从而无法说明文化对语篇的宏观结构以及联结手段等深层次方面的影响。另外，非母语因素也会对受试人的思维造成干扰，这点似乎未受到 Günthner(1993)等人的充分注意。

三、研究角度

以上的问题触发了作者本书的写作，作者希望通过对语篇结构的研究找到两种语言在篇章构建方面的系统性差异。当然提出问题并不难，关键是如何论证这些问题，这里就牵涉到了分析的角度。文学、修辞学或者语言学都有很多关于叙述结构的论述。中国和欧洲都形成了自己的文章写作传统。在欧洲，有关写作的书里，将叙述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引言、中心部分和结尾，甚至还规定了这三部分应该包含人物、场景、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动机等。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 Labov&Waletzky(1967)。他们在分析了口头叙事后

认为,叙事是重现过去的经验,其结构一般为(1)走向,确定时间、地点、人物和情景等。(2)叙事过程,一般用过去时,按时间顺序介绍。(3)结局,示意叙事结束。一个完整的叙事还可能包括点题、评议和回应。

van Dijk(1980)认为,任何语篇都可置于一个超结构(Superstruktur)之下。超结构界定语篇的类型,规范语篇的形式。如一篇叙事,不管其内容如何,形式必然具有叙事超结构。从本质上看, van Dijk 的超结构与 Labov & Waletzky 等人总结的叙事基本结构相同,即包含:背景、主要情节和结局等。同时, van Dijk 在论述诸超结构时进一步指出,句子分析模式中使用概念“主题”(topic)和“述题”(comment)同样适于对语篇结构的分析。他认为,叙事语篇中也包含两点,即预设的背景(topic)以及事件发生的主要情节(comment)。依据这个模式语篇实际被划分为两部分。而这两部分的接点就是叙事的“视点”。

另外,任何语篇都有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之下,有意义的主题句通过语言手段,如衔接和连贯,构成完整的语篇。van Dijk 将其称为语篇的语义宏观结构(Makrostruktur)。它概括了语篇语义的各个层面和语篇意义,并表现了语义间的层次关系和语篇的总体关联。就叙事来说,实际上, van Dijk 的宏观结构涉及到的是叙述者对语篇语义要素的选择和排列。

在分析叙事时,西方学者除了分析语篇的总体布局之外,还强调语篇的微观分析层面。Liedtke (1991)在其创造性的研究中指出:现实中的事件均可被看作在地点和时间中的运动和/或状况的变化,而行为人和客体直接参与其中。同时,这些变化之间往往存在着因果关系。因此他认为,分析叙事必须首先考虑以下几个研究角度:即时间、地点、因果、行为人和事件。

Mihm(1992)更将对叙事语篇的分析模式化。他在对德国和日本学生就交通事故的叙事进行分析时认为,以下几点对于叙事人的叙述还有着重要的作用:1) 主题“交通事故”会激活所有叙事者大脑中已存在的知识模式(Wissensmuster),即图式。这个模式中包含有事件发生的必要要素,比如交通工具、地点、过错、碰撞、损失等等。而所有要素间都存在着时间、空间和因果关联。2) 要求被询问者讲

述一次交通事故，必定会促使他对具体事件进行回忆，并在语言上进行组织，最终完成叙述。3) 听众的期待对叙事的内容和形式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听众的喜好，叙事者是在社会实践中获知的。叙事者要考虑，什么样的内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引起听众什么样的反应。他还要清楚，借助于什么样的语言手段，才能使听众明白，并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好奇。4) 叙事者综合以上的认识建构语篇的语义宏观结构和篇章结构。

Mihm(1992)在其分析模式中分别提到“知识模式”和叙事者“对具体事件的回忆”，Beaugrande&Dressler(1981)将这两点区别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和“情节记忆”(episodic memory)。语义记忆强调一个社会或一个族群日常知识中对事物共同的认知特征，而情节记忆则反映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经历。

本书作者借鉴先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语篇进行研究，选择了以下几个分析角度：语篇的超结构和宏观结构、语篇中的时间关系、因果关系和紧张要素。

本研究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所有叙事均由笔者亲自采录，它们是二十篇中、德口头叙事，两种语言各 10 篇。当然，影响分析公正性的客观因素很多，诸如受试人的性别、专业、个性和在德居留时间等等都直接影响到分析数据。因此在进行调查之前，作者首先设定目标组，即中、德两个不同母语组群中的大学生。作者的基本想法是，大学生教育程度相仿，经历相仿，年龄相仿，并且都生活在德国杜伊斯堡这个工业城市中，外部的生活情况相似，另外，在性别和专业上我们也尽量选择相似的受试人，以便减少偏差干扰（有关受试人的具体情况详见表 1）。采录地点则均选择非正式场合，即：食堂、图书馆、寝室。这样受试人一般不会过于拘束。采录过程作者全部用录音机录制下来。实验中作者使用有微型外接麦克风的录音机。对受试的目的，受试人均已明确，并同意录音和将材料用于学术研究及公开发表。

除了在选取受试人方面尽量做到公正，使其具有可比性之外，作者还事先设置好一个主题。实验时作者请受试人就“吵架”这个主题讲述一个他所经历过的“吵架事件”。通常提问：“请你讲一个你经历过的吵架事件”（Erzähl mal bitte einen Streit!）。叙事经录制后，

完全依原样再逐字逐句写下来。为便于分析，作者给每一篇叙事加上了标题。中文叙事则由作者译成德文。

根据叙事研究通常采取的笔录方法，作者将叙事语篇划分为主题句（Proposition），即含有一个事实的有意义的自然分句。由于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口头叙述，某些情况下，作者要进行一定的阐释才能进行主题句的划分。主题句是语篇中的语义单位，它由指向和谓语组成，而语篇则由相互关联的主题句组成。将语篇划分为主题句，其实就是从语义上对语篇进行阐释，这点使它有别于传统语法以词和句子为基础分析语篇的方法，更便于突出语篇中的隐性语义连接关系。

叙述，特别是日常交际中的自然叙述不会完全由叙述性的语句组成，它还包含部分诸如描述、解释和评论性的非叙述语句。因此在分析中作者也有意识地将叙述句和非叙述句区分开来。在整理数据时，作者还发现了两组语篇长度不一的问题。但作者认为语篇的长度与其语义结构关系不大，同时也不会影响语篇的完整性，因此未纳入本研究的叙事模式对比分析之中。

四. 研究结果

本书的重点是分析部分。通过对语篇的要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文化背景对于叙事语篇的结构和联结手段有很大的影响。德文叙事通常采用直接、客观的语言和方式叙述事件。叙述中，语篇结构划分清晰，联结成分相互照应，阶段过程衔接紧凑。就主题“吵架”而言，事件的高潮“冲突”也同时是叙事的语义核心和叙事者的视点。与此相反，中文叙事最大的特点是语篇的叙述视点难以确定，亦即语义核心往往不是“冲突”，不在事件的过程中。那么中文叙事的视点在哪里呢？根据分析，我们认为，这个点与 Quasthoff（1980）的“交际目标”（kommunikative Zielsetzung）及 van Dijk（1980）的“寓意”（Moral）相同。它才是叙事者真正要说明的事物，而事件本身只不过是背景，是内在思维活动的反映。这便是中文叙事中共同的特性。这个特点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语篇的布局。

研究还证明，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对于叙事起着重要的作用，前者关系到叙事人对其经历的事件的具体回忆；后者则与叙事人大脑

中已经存在着的认知模式有关，其叙述反映了他的文化背景，即其族群的特质。当记忆被激活之时，叙事人大脑中的认知模式也被激活，因此情节记忆中的事件也会在认知模式的框架之中进行加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两组叙事中不同的语义要素的组合和关联，以及他们反映出来的不同的社会价值。

除了认知导致的叙事模式的差异之外，听众的期待(Hörererwartung)也对叙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为叙事者在传递信息时，不仅要考虑到其叙事的内容和结构，也要考虑到听众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以及他们的需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必定面对不同的听众。日常生活和丰富的社会实践造就了叙事者对听众的适应性，培养了他们的交际能力。叙述中，他们必定按照头脑里的交际模式组织叙述和语篇的布局。就中文叙事而言，听众要求叙事者在讲述一个事件时，应该对事件进行内在的加工，要通过叙事说明事件的社会意义和叙事者的看法。因此，中文叙事中事件本身并不处在中心位置。就地点和因果关联而言，中德叙事中都包含有地点和因果语义要素。它说明在两国的认知模式中这方面的区别不大。由此可以认为，德国听众希望通过地点和因果关联来了解事件的每一步发展，因此叙事者必须借助于这些语义要素来解释事件。而中国听众则对事件阶段中的地点和因果关联本身并不太感兴趣，所以叙事者往往按照思想发展情绪，综合概括生活中的不同事件，并形成一个总的观点。

该研究并非尽善尽美，它能够证明叙事语篇确实含有文化的因素，文化直接影响到语篇的结构。了解这些差异，将有助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相互理解。但它和其它至今为止的研究一样还没有提出系统的中文叙事模式，它还是沿用西方的叙事分析模式。这往往会得出与 Kaplan 一样的结论，似乎中国人在叙述时绕圈子、没有逻辑性，造成对中文叙事语篇的错误理解。未来的研究应该主要以中文语篇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建立中国语篇规则模式上面。

II. Textteil

0. *Einleitung*

In den alltäglichen Situationen treten oft Missverständnisse und Konflikte auf.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wird dies noch verschärft, da sie verschiedene Konventionen betreffen, die in den sozialen Etiketten und auch in der Organisation der verwendeten Texte beheimaten.

Verschiedene Kulturen unterscheiden sich nicht zuletzt darin, was in bestimmten Situationen gesagt wird, und auf welche Weise es gesagt wird. Dieser kulturell bedingte Unterschied in der Textstruktur hat bereits die frühen Begegnungen von Europäern und Chinesen erschwert. Auch jetzt werden die Missverständnisse nicht weniger gemindert. Wir hören immer noch die Klagen der Europäer über die angebliche „Undurchschaubarkeit“, „Rätselhaftigkeit“ und „Indirektheit“ der Chinesen und damit verbundene Hypothesen über eine angeblich andere oder gar „fehlende“ Logik innerhalb der verwendeten Sprache dieses für sie fremden Volkes. Wir hören auch die Klagen der Chinesen über die „Promptheit“, „Direktheit“ und „Rücksichtslosigkeit“ der Deutschen und daraus ziehen die Chinesen Ergebnisse, dass die Deutschen allgemein unhöflich sowohl im nonverbalen als auch im verbalen Handeln. Das Thema ist in den letzten Jahren nicht zu wenig von den verschiedensten Disziplinen der Wissenschaft aufgegriffen. Innerhalb der kontrastiven Erzählforschung wurde beispielsweise mehrfach darauf verwiesen, dass Erzählungen nicht nur persönliche oder individuelle Elemente erhalten, sondern kollektive Anteile (d.h. kulturell vorgegebene Anteile) ebenso miteinfließen. Wohin aber das Fremdartige der Erzählweise unterschiedlicher Völker jedoch besteht, ist bis jetzt noch nicht zufriedengestellt beantwortet.

Das Buch versteht sich in diesem Sinne als ein weiterer Beitrag zur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 der kulturellen Unterschiede in Erzählungen. Die leitende Fragestellung des Buchs soll daher lauten: Welche systematischen Unterschiede in den Erzählkonventionen von Deutschen und Chinesen lassen sich, ausgehend von dem mir vorliegenden Datenmaterial, erkennen und worauf sind diese zurückzuführen?

Bevor ich nun mit der eigentlichen,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 beginne, werde ich jedoch zunächst die wichtigsten Ansätze zur kontrastiven Erzählforschung präsentieren. Im Anschluss daran folgt eine allgemeine Übersicht ü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ischen Ansätze zur

Narrativik. In einem weiteren Schritt werde ich dann kurz das von mir untersuchte Datenmaterial erläutern, um dann schließlich die von mir getroffene Auswahl der Untersuchungsaspekte vorzustellen. Die Untersuchung beinhaltet Aspekte wie „Geschichtenkonstitution“, „Zeit“, „Kausalität“ und „Spannung“.

Die Arbeit ist formal so gegliedert, dass auf die Vorstellung der theoretischen Grundlagen einer jeweiligen Untersuchung die Darstellung der Analyseergebnisse folgt. In einem abschließenden Schritt werden dann am Ende eines jeden Kapitels die Ergebnisse im Überblick präsentiert.